

菊与刀



我们对日本的了解与对日本的态度，
首先需要对其民族性格与文化模式有深入的研究，
《菊与刀》在提供参考上，有不可多得的价值。

「美」本尼迪克特 著

黄道琳 译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菊与刀



美 本尼迪克特 著 / 黄道琳 译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菊与刀/ (美) 本尼迪克特 (R. F. Benedict) 著; 黄道琳译.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 - 7 - 221 - 08926 - 7

I. ①菊… II. ①本… ②黄… III. ①文化 - 研究 - 日本 ②民族心理 - 研究 - 日本 IV. ①G131. 32 ②C955. 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6165 号

菊与刀

作 者 [美] 本尼迪克特
译 者 黄道琳
策 划 崔正坤
责任编辑 杜培斌 耿 芸
特约编辑 龙若飞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970 × 700mm 1/16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14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译序

本书是露丝·本尼迪克特《*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1946)的全译。

著者露丝·本尼迪克特夫人生于1887年，原姓富尔顿(Fulton)，1914年结婚后，乃从夫姓。

本尼迪克特就读大学时主修英语文学，曾以笔名发表诗作。这一训练背景对她影响颇深，她的研究著作，时常呈现人文学科的精神面貌。

本尼迪克特转向人类学研究之前，曾修过三年文学课程。后来她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成为人类学大师博厄斯(Franz Boas)的早期门生之一，于1923年获博士学位，次年即开始在哥大研究所授课，本尼迪克特最初的研究，完全遵循博厄斯的门径，以探究文化特质的传播为主。

这段时期，本尼迪克特尚未矢志以人类学为终身事业，1927年至北美比马印第安部落从事田野工作，发现建立新学说的可能，才对人类学抱更大的热忱。在这次田野经验中，她发现文化并不只是形成人格的环境，而且也是“个人性格投射而扩大的银幕”(Personality writ large)。本尼迪克特将这一新见发挥，写成《文化模式》一书(*Patterns of Culture*, 1934)，这本书已成为人类学的经典著作。在此，本尼迪克特不但说明人格与文化的关系，更进一步指出，一个民族的许多不同的个人性格中，可以找出特有的共通点，这就是所谓的“文化模式”。

本尼迪克特是少数几位深具人文精神的人类学家之一。她相信人

类具有无限的创造可能性，个别文化只是这无限之中的部分元素所构成的一个“形貌”（configuration）。再者，我们对各项文化特质，必须从整个文化系脉中去做相对性的评价。这种看法就是所谓的“文化相对观”（cultural relativism）。值得注意的是，本尼迪克特并不像某些倡言“文化相对观”的学者，认为任何普遍的道德律则都不能成立。事实上，1929至1945年间，本尼迪克特不懈地从事一项道德使命：利用人类学知识来证明种族歧视的谬误。她在这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是1940年出版的《种族：科学与政治》（*Race: Science and Politics*）。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诸多国家为了了解敌方民族，于是借用人类学家从事“民族性”的研究。由于战事的阻挠，人类学家只能利用极少数报道人及文化成品——电影、戏剧、小说、史籍等——从事分析，这种研究方式称为“文化的遥研”（the study of culture at a distance）。在这方面，本尼迪克特研究过罗马尼亚、荷兰、德国、泰国民族，而以《菊与刀》一书成就最大，影响最巨。这本书的价值不但在于它清晰地勾画出日本民族性格及文化模式，更重要的是它强调了民族、文化之间相互了解与容忍的精神。

《菊与刀》出版后，本尼迪克特继续在哥大参加“当代文化研究”计划，但随即于1948年因病逝世。

李 序

1924年冬天，露丝·本尼迪克特写给她的同行与挚友爱德华·萨丕尔一首诗：

*Our task is laughter, We must learn to wear
Its farthest implications in our souls,
Ands fashion our years out of the mocking flare
Of ultimate drolleries. Who else cajoles
A greater wisdom from the rotting years?
Who else inherits earth's two hemispheres?*

从这一首诗里我们可以看到本尼迪克特对人类责任的体会，以及对于人性本质追寻的热忱。

对于学人类学的人来说，露丝·本尼迪克特是美国人类学史上首屈一指的女人类学家，这是大家都熟知的事实。但是很少人知道，她也是一个出色的诗人；不只是一个诗人，“她本身就是一尊优雅的柏拉图式的诗神”。我们要从本尼迪克特的人类学著作中去了解她的思想实际上是不够的，我们同时也要从她诗人的气质去体会，才能真正了解她的人类学思潮。

本尼迪克特一生中有两本最著名的书，一本是《文化的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 1934），另一本就是这里所译的《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1946）。这两本书在外表上看来虽颇不相同：一本是通论性的，一本是分析一个特定文化的。可是若从内容上细致了解，我们可以发现二者之间有一共通点，那就是作者在刻画分析一个文化时，都企图说明每一个文化都有一个主题，以这个主题为中心而后表现出该文化外在的习俗、制度与行为，这就是她所说的

文化模式。在《文化的模式》一书中，我们知道她用“日神型文化”（Appollonian）来描述祖尼印第安人（Zuni Indian）的严谨自律的文化主题，而用“酒神型文化”（Dionysian）一词来描述瓜基乌图印第安人（Kwakiutl Indian）的粗暴与冲动的文化主题。在本书中，读者们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她也同样地企图用《菊与刀》的内涵来说明日本民族的双面性格。

本尼迪克特女士之所以喜欢用蕴含默示的方式来描述文化，并不是偶然的事，实际上她是以诗人的感情与气质去体会文化的巧妙内容，而企图借用诗的形式和简洁的词汇来道出文化的精华；从这一点上而言，她已不仅是在描述文化，她是在欣赏文化了！

对于受过严格社会科学训练的人类学家来说，本尼迪克特的这种文化模式研究实在有失于太印象化、太笼统化了。对于现代行为科学家而言，要追求人类行为与文化的通则，一定要做到客观的分析，最好要有量化的素养与决心，若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本尼迪克特的研究自然与之相去有一段相当的距离。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文化的研究与自然的研究到底有所别。对于物的世界的研究，我们可以不具感情而以绝对客观的态度来处理；但是对于人所创造的文化，除去分析研究之外，具有一种欣赏的精神也许是不可缺失的。因此，我们假如把本尼迪克特女士这本名著看作是科学与文学的混合，那么我们对它的评价就大有不同了，这也许是这本出版于二十多年前的书会被翻译的原因，同时也是我乐意为译文写序的原因。

译者黄道琳君是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研究所的学生。他在进入我们这个研究所之前，毕业于台大外文系，是一个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和丰富感情的青年，所以是最合适于翻译这本具有文学气质的科学著作。黄君在翻译本书之初，曾征询我的意见，我也鼓励他赶快开始，我觉得他能把丰富的感情用之于学术名著的译述，应该是很值得的事，这是我乐意于为之写序的另一原因。

李亦园

《菊与刀》的启示

在浩繁的社会科学和日本研究文献之中，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无疑是知名度最高的著作之一。

这本整整四十年前出版的书，虽然称不上是人类学的最佳经典，但它自1946年以来，便持续地畅销于书市，并译成多种语文，成为许多人接触人类学的入门书。这本书在日本研究的课题上，也绝不是无懈可击，但由于它对日本民族及文化的生动描述，使得不少人碰到“日本”两个字时，便很自然地想到《菊与刀》这个意象了。

从战事的需要到诗画的意境

文化的差异，往往是误解的起源；族群的区分，更常是仇恨的渊藪。人类学家的最大愿望，就是要化解这种误解和仇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日交战正炽，美国政府和军方急需有关日本民族性格和文化习俗的研究报告，备供制订作战策略的指南。

本尼迪克特受命从事《菊与刀》的研究和撰述，并不采取急功近利的态度，也未囿于敌我两立的观点；相反，她确切地掌握了人类学的基本信念，从文化的基础来了解日本人的行为，她也淋漓地发挥了人文主义的精神，以相对的立场来评估日本的长短。因此，《菊与刀》让人读来感觉既写实又具想象力，既平实又富同情心。对于日本民族的描绘，对于日本文化的述说，《菊与刀》庶几达到了诗画的意境；这种成就在汗牛充栋的学术著作之中，是极难得一见的。

今天，日本对我们来说已不再是侵略者或交战国。可是，正如本

尼迪克特所预测的，战后的日本人“心中还存有一把剑，他们慎防这把剑生锈，在这磨砺之中，他们可以孕生一股强大的力量”。今天，日本在国际间的地位、它对我们的影响，逼使我们不能不更严肃地来探索这个民族与这个文化。

就更现实的层面而言，日本挟其强大的势力，对我们所造成的科技上的宰制、商业上的支配、文化上的侵蚀，也使我们在对日本的“奇迹”和“神秘”产生惊愕和茫然之余，不能不冷静下来寻找有系统和整体性的了解日本之途径。这项课业的起点，厥为把日本人的性格和文化放在他们自己的观念架构中来加以了解分析；而《菊与刀》在这方面的成就，在今天，仍然是个典范。

文化的遥研 统形的探索

在本尼迪克特之前，人类学家绝少企图对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复杂社会进行全面性的分析。这是好高骛远的工作。在本尼迪克特进行日本研究的时候，正是烽火遍地之际，她根本无法前往日本做实地的调查。这又犯了人类学的大忌。虽然有这些限制，《菊与刀》却具有极高的可信度和可读性，这就要归因于本尼迪克特的洞识力和人文素养了。

本尼迪克特所利用的是日本电影、戏剧、小说与史籍等二手资料，并辅以日本战俘及日裔美人的访谈纪录，经此而进行对日本的“遥研”。从这些零碎的材料，本尼迪克特却能理出日本文化的一幅统合的形貌。

《菊与刀》所呈现的日本人性格和文化，不是无数支离独立的奇异特质，也并不宛如一堆毫无关联的砂粒，而是一张严密有致、条理清晰的蜘蛛网。

在本尼迪克特眼中，文化具有极高度的统合倾向，每个文化由一

个支配性的主题贯穿而成意义的整体。零散的日本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乍看是不可理念的奇异风俗，但如果将之纳入这个统合的模式和意义的整体来看，便可轻易地明了其究竟。在这一点上来说，《菊与刀》是可以帮助我们对日本这个神秘国度除魅的一本书。

《菊与刀》又是一本文笔清丽、结构优美的作品；贯穿全书的是日本人的伦理体系这一条主轴，“忠”、“孝”、“义务”、“义理”、“人情”等这些伦理规范，是触发日本人行为的原动力。

本尼迪克特并不由抽象的概念层次来分析这些基本规范，而是举出日本人日常生活中的细微事例来作生动的解说。

在同属东方文化传统的我们看来，“忠”、“孝”等这些伦理观念，乃是生活中稀松平常的东西，不觉得其中有什么新意。但在来自另一文化传统的本尼迪克特看来，特别是在采取人类学的比较文化观点之下，这些东西却是了解日本民族之行为及日本文化之精义的不二法门。不可讳言的，在本尼迪克特的分析之中，难免有些地方显得小题大做，甚至离谱而令人不禁莞尔。不过，这是不掩大瑜的小瑕。

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民族性格的探索，精彩之处却不在于上述伦理规范的静态描述，而是在于巧妙地呈现出不同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之间的动态关系和紧张情境。

归根究底，日本文化及日本人行为的统合性，并不是轻易达成的，而更像是走钢索者在不断地移动之中所获致的平衡。本尼迪克特指出，日本的伦理规范不是概化的律则，而是可随情势而变通的；日本人是极端机会主义的民族，精于权变之道，其手段可视环境而取舍。世所瞩目的日本民族之善于学新求变，而又能维护其传统于不坠——这种日本性格的二元性，正是本尼迪克特所归纳出的结果。

硬心肠的文化相对观

以今日的社会科学水准来衡量，《菊与刀》当然不是没有缺点的。

第一个缺点源于本尼迪克特的理论取向。在当时，本尼迪克特服膺的是刚崛起的“文化与人格”理论；这一学派想要结合人类学和心理学，企图以幼童的训练方式，来解释民族性格和文化特质。

因此在《菊与刀》里，她便有意把日本人的性格和行为归因于他们在幼年所受的训练，特别是排泄训练的方式上。这种极端的化约论，带有几分宿命观的色彩，终必使我们对日本的了解陷入莫可如何的境地。

第二个缺点，是本尼迪克特过分高估了文化主题的统一性，太突显了文化模式的美感值。任何文化，包括日本文化在内，与其将之看作一张井然有序、和谐美丽的蜘蛛网，不如像另一人类学家所主张，将之视为一只章鱼——不错，它是一个统合的有机整体，却统合得有点笨拙。

有了这种对文化之笨拙面的认识，我们可以进一步培养一种硬心肠的文化相对观。回过头来说，这种面对民族异文化时应具的平实、不卑不亢的态度，其实正是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所遗留给我们的最重要启示，也正是我们今天想要重新探索日本时所不可或缺的。

当我们面对任何异文化时，不能采取狭隘而绝对的主观立场去看待。日本的文化有其独特的面貌，日本人的行为有其正当的价值；正如对任何其他民族的文化和行为一样，我们必须对之进行了解、加以重视。

另一方面，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更不得不硬起心肠，于欣赏赞叹之余，于研究学习之后，也要进一步正视日本民族性格及其文化的缺陷，而提出批判性的见解。

黄道琳

自卑的罪孽

——读《菊与刀》随想

江户摇篮曲，以及许多日本的民谣与儿歌，那柔婉与凄迷，那如怨如泣如诉的素朴而幽悒的情调，在我童年到少年的心中，引发我对日本的哀怜与同情之爱；许多曾经旅日的中国文人对日本的地理及人文的描写，尤其对日本女性的摹绘，更引发少年的我一股如诗般的憧憬之情。如同我对印度的文学、电影与民谣的痴恋一般，日本的风情，那都是东方的伤感与凄迷之美之极致，长久使我向慕。

“荒城之月”，这一首日本民歌是甚著名的，小时候所偏爱的中外名歌，歌词大都忘了，但它尚依稀在我心中记着：“岁月如流春已去，消逝花丛里，狂欢时节最难忘，燕尔新婚时，荒城繁华今何在，欢声已沉寂，悠悠往事如云烟，朦胧月色里。秋来大地颜色变，披上红衣衫，雁行成群天上过，年年复年年，逝水流光逐飞鸟，明月照高天，月色茫茫城影暗，无语对愁眠。”无常的幻灭感，如樱花之璀璨一时，旋即凋萎。一方面是壮丽，另一方面却是哀恸。

日本的性格，大概来自人类最深重的一种自卑感。不论表现为武士的强毅、冷静、自制，或表现为军事侵略的凶残顽恶，或表现为经济掠夺的嚣张跋扈，皆为其深重的自卑感之表现。在这一点上，一个国家与一个人是一样的。一个人的自卑感来自肉体上的或心理上的残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自卑感，则来自地理上的或历史上的诸因素。

日本作家长谷川如是闲在《日本的性格》中说到日本的地理环境说：“日本的地势南北长，从北端的寒带到南端的亚热带，气候差别

很大，中央部属温带，气候温和，可是由于地势狭长，中间纵贯着险峻的山脉，两侧土地分向日本海及太平洋急剧倾斜，缺乏平原；河川除少数外，大多浅而急促，雨量一多，就有泛滥之虞，加之常有火山、地震和台风等灾害，这些自然条件，殆无法使人有幽悠的心情，因此日本人往往为一时打算，而不为永远打算。日本人虽然敏捷，可是不够持重，日本人对世界的刺戟非常敏感，往往陷于盲目模仿，以及其他非真正大国民所有的特质。”读了这一段文字，联想到1972年我在日本旅行时所看到日本乡野老式的民居，那些像火柴盒一般轻灵、狭小、简陋、单薄，一如旅人的帐篷。生活在这种房子里的日本人，世世代代，似乎有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危机感，准备随时弃家他去，另造“帐篷”。自然灾害的频繁与威压，使日本民族产生了及时行乐、眼光短近的特性。与中国人在那种深宅大院、树木森森、苔痕满阶的古老民居中涵养出来的悠远博厚的气质，自不可同日而语。

地理的缺陷，造成民族的自卑心理，日本遂永世摆脱不了这自卑心理的阴影。但是，一个产生武士道的日本民族，其性格的另一面是勇武精竞。日本人急需世人的尊敬，勇于对荣誉的博取。过去日本天皇与中华大帝国的外交文书，常用“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或“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等语，日本之不甘以小国的卑屈立足世界，矢志与大国获取平等之地位，这一番愿望，都因地理环境的缺陷所造成的自卑感而绝望，反而激发了日本凶悍的蛮性和狂妄的野心，以寻求自卑缺陷的弥补。日本在历史上所造成的罪孽，无疑的由于深度的自卑所引起。

然而，日本并没有因自卑而颓唐消沉，反而，因自卑而激发起最奋发与进取的德行。这种矛盾的现象，促使行为科学家致力于日本民族性的深入研究。尤其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美国面对这一个最陌生的敌人——日本——的思想观念与行为习惯感到困惑不解，因而聘用了一群行为科学家从事研究，以为战争提供了了解敌人行为的内在

性格根源的服务。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就是研究日本民族性格、文化模式的名著。

必须指出的是，历史上有关一个民族与国家的文化与性格的论著并不新鲜，而且，即使说汗牛充栋，也不过分。就对日本而言，中国有关日本的论文或专著，就已为数不少。《菊与刀》一书之不同于许多其他论及日本的著作者，乃在于这本书是以昌盛于美国的一个新科学——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的方法来写作的。行为科学是心理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合作，是20世纪下半以来对于19世纪的“专门主义”（Specialism）的反动，而趋向于科学的统一（unity of science）或科际的整合的一种新学术。《菊与刀》就是在这个学术气候之中的产物。这本出版于1946年，直到今年（1974年）我们才欣见中译本的出版。

在解释自卑与进取之间的矛盾上，《菊与刀》所提供的日本民族性的根源，给了我许多资料与论据。

一个自卑的人若不肯（或未到）自甘堕落，时常表现为极端的爱好荣誉。日本的奋发与进取，就是这样的情况。日本人很在意世界人士对他们的看法。书中说“美军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时，日本所下的军令是：现在他们在举世瞩目之下，因此必须表现日本人的特色。日本海军官兵有一条戒令：如果他们受到鱼雷攻击而受令弃舰，那么在登上救生艇时必须极度遵守礼节，否则‘将会受到全世界的嘲笑，美国人会把你们的丑态拍摄下来，送到纽约放映’。他们把世人的观感看作严重的事，而他们对这一点的注重也是深嵌在日本文化之中”。在日本，“重名誉之人”就是“知耻之人”，就是“有德之人”。书中第十章论及“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说日本是耻感文化，倚赖外在强制力以达到善行，与罪感文化倚赖内在的罪恶自觉，绝然不同。“罪感”者是自觉有罪；“耻感”者是因暴露于世人之前，必遭嘲笑与

挨斥而生的羞耻感。我想如果世界没有许多比日本更强大优秀的国家，日本可能丧失荣誉感的争求心，便不致演成历史的悲剧罢。

希求荣誉，在战争中可以是勇敢与顽强，在和平中便常是虚荣与炫耀。我们可就近取譬：日本之争取达·芬奇名画《蒙娜丽莎的微笑》到东京展出，不无炫耀之动机，此与以前办世运之出力、与东京铁塔之比巴黎艾菲尔铁塔高出一小截，皆为满足名誉的心理所驱使。我们都知道日本人住宅之整齐与洁净，到了惊人的程度，那已超过了卫生与舒适的目的，而是一个主妇炫耀能干、尚洁等德行的表现了。这种极爱面子，在意于他人臧否的习性，是日本借以发愤图强的一般激动力。

日本人极重视“义理”（小节），更重视“忠”（大节），是以一个本来弱小的民族，由于有了极端的忠于国族的精神，故服从亦是坚强的内涵之一，因而日本民族极其团结，而以天皇为最高崇拜对象。对于自己的名分所应尽的“义理”与对天皇的“忠”，有时到了不可理喻的“虔诚”。比如到了年终而无法清偿债务，或者因向民众奉读天皇敕语犯了口误，都可导致当事者引咎自杀。

生存的意志与奢望荣誉，使日本民族有了勤奋、踏实、团结、服从、忠勇、负责、善变等特性。投降后的日本，明白了通过军国主义之路并不能给日本带来世界的地位与荣誉，他们立刻承认谬误，并马上将精力投向别的方向，而有战后日本经济的突飞猛进。投降后，日本一家新闻机构已经开始论述“新艺术与新文化的诞生”：“我们必须坚信，军事的失败并不影响一国的文化价值；军事失败毋宁是转机的原动力……国家失败虽是惨痛的后果，但反过来说，这却能提升日本人民的心灵，因而正对世界、客观地审观事物。使日本人思考偏曲的一切非理性因素，都必须借坦率的分析加以去除……正视战败的冷酷事实，需要具有极大的勇气，（但我们必须）对明日的日本文化抱持信心。”日本一切的努力，常表现了他们对曾经

付出极大代价的一句口号——“日本必须求得世界各国的尊重”——的狂热实践。这表面上是自尊心的表现，实际上，我认为这是日本民族极深重自卑感的反映。

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对日本民族所作的分析，不能说最完善，但以最新的方法来探索一个民族心灵的本质，有寻常的《日本论》一类的书所不及之处。中文本译笔清晰可爱，因为作者与译者都是文学修养很高的人。据“译序”言，本尼迪克特在从事人类学研究之前，主修英语文学，并曾发表诗作。故此书虽为一“科学”论著，但充满了文学的气息，单是书名《菊与刀》，便令人感到饱含诗的象征，使我们在阅读本书之前，便充满一种审美的心情，来欣赏一位美国学者对一个东方国家的描绘。

日本是我国的老邻居，曾经因中国文化的滋养而成长，又曾经回过头来侵略中国，复由经济上的暴发而再度有对中国不义的行为。我们对日本的了解与对日本的态度，首先需要对其民族性格与文化模式有深入的研究，《菊与刀》在提供参考上，有不可多得的价值。自然，此书出版已几十年，日本的国情与民族性格已有很多变迁，需要吾人进一步研究。我在《苦缀的美感》中有“扶桑走马”一文，叙述我在日本的观感。

但这本书并没有在日本民族的自卑心理上有所发掘，我却深深感到这一点是了解日本民族的命运与性格十分重要的关键，故我等于把本尼迪克特此书的论点，拿来作为我的结论的注脚。自卑感并不一定是劣恶的情愫，因为古今中外许多伟大的人物与事功相当多是由此情愫所激起的。但是，日本的自卑感，已造成它在近代史以降在军事政治与经济上，对人类（尤其对中国）犯下了罪过，所以我悟到自卑不一定止于自身的失败，且可造成对别人的罪孽。这种不幸的感情，如果不能成为“生长”的激素（像“大化革新”之仿效中国，“明治维新”之仿效西方，终成为日本进步之原动力），便要成为毁灭的因子。

日本人现在大概已经不大唱“荒城之月”一曲了，因为，那曲中的感伤与沉寂中的慨叹的况味，大概已为拼命做生意的现代日本人所忘却。

何怀硕